

# 前凉兴晋太守郎坦任职考\*

魏军刚

《晋书·张轨传》载：“俄而（后赵）麻秋进攻枹罕，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武城太守张俊曰：‘弃外城则大事去矣，不可以动众心。’宁戎校尉张璩从之，固守大城。”<sup>①</sup>按，此段史料记载东晋永和三年（后赵建武十三年，前凉建兴三十五年，347）四月后赵麻秋率军进攻前凉枹罕城之事，其中提到前凉方面镇守枹罕城的官员之一“晋阳太守郎坦”。而关于郎坦的任职问题，诸史记载存在分歧。除《晋书·张轨传》，清代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五》亦作“晋阳太守”<sup>②</sup>，又《资治通鉴》作“晋昌太守”<sup>③</sup>，而明代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四》则兼存“晋昌太守”“晋阳太守”二说。<sup>④</sup>清代考据学者对前凉郎坦任“晋阳太守”提出质疑，但又没采用《资治通鉴》“晋昌太守”的说法，而是另提出“晋兴太守”的观点。<sup>⑤</sup>综上所述，涉及前凉郎坦的任官问题，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晋阳太守”“晋昌太守”“晋兴太守”三说。有鉴于此，笔者试从前凉调整地方政区和比照《晋书》版本文字异同两方面入手，澄清史实，进而另提出“兴晋太守”之说。

## 一 前凉郎坦任职活动地点与晋阳、晋昌二郡无涉

据上引《晋书·张轨传》可知，前凉建兴三十五年四月后赵麻秋率军进攻枹罕城时，郎坦的任职、活动地点在兴晋郡治所枹罕，晋阳、晋昌二郡均与此无涉。

首先是晋阳郡，十六国时期并无此郡，晋阳县则是作为秦汉以来太原郡治所出现在史籍中，隶属并州管辖，魏晋以降至十六国初期未有改变，与地处陇右的枹罕城未有直接的地域关系。又，前凉初期虽大量侨置郡县，但主要是针对秦雍流民而置于河西走廊东部地区。《晋书·地理志上》载：“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郾、平狄、司监等县。”<sup>⑥</sup>目前所见的诸史籍中，并没有见到前凉统治者针对并州太原流民而侨置晋阳县或晋阳郡的相关明确记载。因此，“晋阳”作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十六国北朝西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1CZS061）阶段性成果。

① 《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42页。

② 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澍萌、罗新、华喆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前凉录五》，中华书局，2020年，第827页。

③ 《资治通鉴》卷97，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四月，中华书局，2011年标点本，第3126页。

④ 参见崔鸿撰，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73《前凉录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63册，第909页上栏。

⑤ 参见洪颐煊：《诸史考异》卷3，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刻本；周济：《晋略》第5册，光绪二年味隽斋刊本；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卷4，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6页；吴士鉴：《晋书斟注》卷86，民国嘉业堂刻本。

⑥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前凉时期地方郡的名称出现在史书中必是讹误，魏俊杰考证前凉政区亦不列“晋阳郡”<sup>①</sup>。所以，《晋书·张轨传》记郎坦任“晋阳太守”当有问题。其次是晋昌郡，《晋书·地理志上》“凉州”条载：“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sup>②</sup>按，晋昌郡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前凉建立后继承西晋仍置此郡，辖境当无变化。<sup>③</sup>在张骏分境置州后，晋昌郡隶属沙州，与河州兴晋郡治所枹罕亦无地域关联。如果认为郎坦是以前凉晋昌太守身份远赴千余里参与枹罕保卫战，既无其他史料相佐证，也不太符合情理，故《资治通鉴》记郎坦任“晋昌太守”亦有问题。

综上所述，可基本排除前凉郎坦任官“晋阳太守”“晋昌太守”二说。

## 二 清代史家校改前凉郎坦官职为“晋兴太守”缺乏依据

针对《晋书·张轨传》记“晋阳太守郎坦”，清代考据学者另提出“晋兴太守”观点。洪颐煊《诸史考异》<sup>④</sup>、周家禄《晋书校勘记》<sup>⑤</sup>及吴士鉴《晋书斟注》<sup>⑥</sup>在校勘《晋书·张轨传》时，均认为郎坦所任官职“晋阳太守”应为“晋兴太守”之讹误，而周济《晋略》更径作“晋兴太守郎坦”<sup>⑦</sup>，但这种改法实际上是缺乏依据的。

从文献本身来看，《晋书·张轨传》载：“俄而麻秋进攻枹罕，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根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可知，“晋”字前的“时”字除殿本外其他版本都作“与”字。<sup>⑧</sup>各版本之间文字差异集中在“时”“与”二字，而“晋”字后的“阳”字是没有争议的。如果说，将“与”视为衍字，尚可说的通，那么将“阳”字校改为“兴”则缺乏依据。

前凉时期，确实设置晋兴郡。《晋书·地理志上》记载，张轨“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鞞、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sup>⑨</sup>。据此，前凉初期枹罕确为晋兴郡属县，但是，在整个前凉时期枹罕并不是一直隶属晋兴郡的，在张骏设置河州后改属兴晋郡，作为河州和兴晋郡的州治和郡治。

《晋书·地理志上》载：“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sup>⑩</sup>由此可见，前凉张骏后期分境内诸郡，自西向东依次设置沙、凉、河三州。晋兴郡与兴晋郡并存，但分属凉、河二州，枹罕则由晋兴郡划归兴晋郡。<sup>⑪</sup>此次前凉调整地方行政建置是基于加强对境内诸郡控制而以地域单元为划分依据的，张轨时期晋兴郡分西平郡而置，主体在河湟之地，而张骏新设置的兴晋

① 参见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1—197页。

②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③ 参见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195页。但魏俊杰在该页注①提到《晋书·张轨传》记“晋阳太守郎坦”时，采用了《晋书》校勘记[八]的说法，认为郎坦的任官地不是“晋阳”，而在“晋昌”。

④ 洪颐煊：《诸史考异》卷3，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

⑤ 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卷4，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6页。

⑥ 吴士鉴：《晋书斟注》卷86，民国嘉业堂刻本。

⑦ 周济：《晋略》第5册，光绪二年（1876）味隽斋刊本。

⑧ 参见《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54页。

⑨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⑩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⑪ 参见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189页。

郡则位于前凉陇右“河南地”，《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此标注甚为明确。<sup>①</sup>

因此从前凉张骏时期地方政区调整和枹罕行政归属变更看，当时晋兴、兴晋二郡共存且隶属不同的州，清代史家将郎坦官职由“晋阳太守”校改作“兴晋太守”，似乎欠妥。

### 三 比勘《晋书》版本提出郎坦任“兴晋太守”符合情理

我们结合史书记载郎坦任职、活动地点和前凉张骏时期枹罕改属河州兴晋郡等情况综合判断，提出第四种观点，即“兴晋太守”说。

通过比照《晋书》诸版本记载异同和辨析其衍文讹字，亦能证前凉郎坦所任官职为“兴晋太守”而非其他三种说法。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晋书》涉及前凉郎坦官职的内容衍字、讹误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张轨传》校勘记〔八〕载：“‘时’，各本作‘与’，今从殿本。‘晋阳’，《通鉴》九七作‘晋昌’，疑是。”<sup>②</sup>很显然，校勘者独从殿本而否定其他版本，改“晋阳”之前的“与”作“时”字，诚不可取；而其又疑“晋阳”二字为《资治通鉴》所作“晋昌”二字，则如前文所论亦不可取。

查阅《晋书·张轨传》诸版本，“晋阳”二字前的“与〔與〕”字同“兴〔興〕”的繁体字，字形非常相似，“与”字或以形近致误而原作“兴”字。如此，则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张轨传》记“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一句，亦可释作“兴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晋”字之后的“阳”当为衍字，或者理解成是“郡”之讹字亦可。前凉时期编修的诸史书及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早已散佚，虽难再覆校原文，然而将“晋”字后缀的“阳”字解释成文本传抄中出现的衍字，则可成立。清代诸史家尽管指出“晋”字前的“与”字乃衍文，却并未考虑“阳”或是“郡”字误写，亦或“阳”才是衍字。

###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分析郎坦据守枹罕城与上说诸郡之地理关联和其行政隶属变动的的基础上，提出第四种观点“兴晋太守”说。

张骏统治后期，前凉地方行政建置调整，原属于晋兴郡（属凉州）的枹罕划归新成立的兴晋郡（属河州）。张骏死后，张重华即位之初，后赵趁机进攻河西，并围绕枹罕的控制权与前凉展开争夺。郎坦作为“兴晋太守”参与河州刺史、宁戎校尉张璩抵御后赵麻秋军事进攻是符合情理的，而其如以“晋昌太守”（属凉州）或“晋兴太守”身份跨政区参战，既无相关史料相佐证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再考虑到前凉没有设置过晋阳郡，而《晋书·张轨传》却记郎坦任“晋阳太守”则更无可能。

另外，《晋书·张轨传》记“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一句，在改写与校勘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基于“與”“興”二字形近易致传抄讹误的可能性，将《晋书·张轨传》诸版本“与〔與〕（中华书局点校本从殿本作“时”字，今不取）晋阳太守郎坦”改成“兴〔興〕晋阳（“阳”字或为衍字，亦可理解为“郡”之讹字，可去掉）太守郎坦”也是基本成立的，由此从另一种角度证明了前凉郎坦任“兴晋太守”的观点。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11—12页。

②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54页。

【编者按】著名学者邹逸麟先生于2020年去世。他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和第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邹先生求真务实、疏朗率直、诲人不倦，他的逝去是历史地理学界、方志学界的重大损失。今年是其去世两周年，邹先生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华林甫特撰纪念文章，缅怀以邹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学者，张扬他们惠及几代学人的精神，推动历史学、方志学研究砥砺前行。

## 沪上问学记（一）

——敬悼恩师邹逸麟教授

华林甫

先师邹逸麟教授，离世已两年有余，回想起邹门问学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余生也晚，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六届考生，1982年高中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幸运地以第一志愿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于是从浙江乡下来到大上海。我的本科学号是8214056。大一、大二是学中国通史、史学概论、历史文选等基础课，大三时，我们班级分成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两个专业，我被分到历史地理学专业，所以大三、大四聆听了邹逸麟、胡菊兴、郑宝恒、魏嵩山、周源和等老师的历史地理学课程，从此与复旦师友结下不解之缘，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历史地理学这个行当。

记得邹老师给我们本科班级上课，第一句话说，谭其骧先生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认真”二字。乍一听，平淡无奇，作为本科生根本无法领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深意。有一天傍晚，邹老师来到6号楼（男生宿舍），与选课的本科生座谈。他说，如果选择学历史地理的话，不需要太聪明，只要肯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事，今后多多少少会取得一些成就的。听他这么一说，我自忖天生愚钝，除了善于应付考试之外别无长处，理论素养又欠火候，坐冷板凳则是做得到的，乡下人在田里、地里干活就得勤奋，绝不会偷懒的。于是，就抱定了学这个专业的决心。

大四考研，史地所的硕士生招生名额才两名，而全国报考16人，除了我们自己本科同学之外，还有校外的青年教师。考研时间是寒假里的除夕前几天，考完试我就回家过年。来年开学，得知考试过线的只有4人。于是，在复旦大学西南角100号楼南侧的简易棚进行差额复试，考官有邹逸麟、吴应寿、王文楚3位老师，我随机抽到的题目是如何查找历史地名，最终录取了王振忠和我。

1986年秋，硕士生入学报到，邹老师把我与振忠年兄叫到办公室，吴应寿先生也在场，指着我说：“你跟我，王振忠跟吴先生”。就这样，开始了邹门问学的经历。当时的招生规则，一般是名下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方可招收下一届学生。所以，在我读研的3年时间里，邹老师名下就只有我一个学生，我的硕士研究生学号是861426。

当时的史地所学生较少，谭先生还能亲自过问。读研的第一学期，邹老师告诉我和振忠年兄，谭先生要求我们俩阅读《资治通鉴》。于是我们照办。因集中精力读了隋唐部分，期末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通鉴·唐纪〉胡注地理正误》，邹老师认为考证得不错，让我修改，推荐给所

刊第2辑发表（发表时我已到北京工作）。读《资治通鉴》时，买来《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北宋吴缙《〈新唐书〉纠谬》一书有失误，写了一篇读书札记，邹老师批改这篇作业的墨宝至今保存完好（见图1），修改后作为补白发表在《历史地理》集刊第7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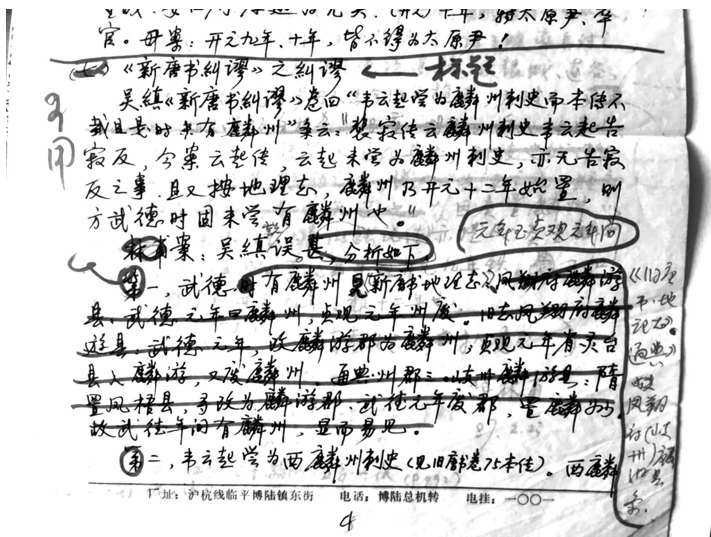


图1 邹逸麟老师红笔批改我作业的笔迹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课程很少，学生有很大的自由支配时间，所以到图书馆读书成了每天生活的标配，更多的是靠学生自己钻研，遇到问题就提出来向老师请教。为此，我经常找邹老师问问题，有时候在他办公室，有时候到他家里，有时候在美丽的复旦校园，而有一次是与他在国年菜市场买菜时的邂逅，他不嫌我在学术方面问这问那，花费时间给我耐心解答、与我讨论，鼓励我钻研。如果是在他家里（当时他家在第二宿舍，很狭小的住房），师母会给我沏上一杯茶，或者拿来水果，令人如沐春风。在与邹老师学术聊天的过程中，知道许多书名、学者，逐一去图书馆查阅，他让我阅读前人治学心得一类文章，也知道了一些学术动态，于是便渐渐入门。拙文《〈括地志〉辑本校读》，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写成的（刊于《文献》1991年第1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邹老师除了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之外，还承担着史地所的行政职务，具体负责史地所的正常运行，我如此占据他大量有效时间，当时缺乏感觉，工作之后才体会到愧疚。那几年，他说他只发表了《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一篇论文，可见许多有效时间都被挤占了。

邹老师给我们开设《历代河渠水利志研读》课程，讲到黄河、长江、运河变迁我们听得兴奋，讲到漳河、卫河、贾鲁河则如堕五里雾中。他曾提及，即使小说也是我们历史地理研究的史料，如刘鹗的《老残游记》开篇就是治理黄河的。期末作业是学生自己选择一部水利典籍，写阅读体会；当时我选了张鹏翻《居济一得》，仔仔细细认真阅读了，但读书笔记写得一般，邹老师给我打了个“优”的成绩（见图2），纯粹是出于鼓励。

复旦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经常有校内外名师受邀来演讲，我曾聆听过费孝通、李泽厚、蔡尚思、徐中约、庞朴、庞卓桓、王尧、金维诺、金重远、李学勤、陈桥驿、吴廷嘉等先生、女士的讲座或讲学。1987年秋，邹老师邀请云南大学李埏教授来复旦开设系列讲座，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指定由我接待，于是经常去李埏教授下榻的专家楼、陪着走到教学楼，

从中得知李埏教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学问做得好，外语也精通，令人肃然起敬。李埏教授说，“小华你三倍的年龄也不及我大”。如果我具备中国经济史的点滴知识，就是从那时开始学的。

邹老师的学术兴趣广泛，我见到他经常翻阅《新文学史料》，在我看来与历史地理学毫不沾边。他讲话很风趣，也让我了解到学术界的一些逸闻轶事。例如，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搬迁到大西南，所长是傅斯年、副所长是郑天挺，于是有了“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的趣闻。又有一次，邹老师给全校学生上过一堂关于历史上河流演变的选修课，当讲到长江时，改编了一下著名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台词，代号黄河的说：“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代号为长江的作答：“黄河、黄河，我也是黄河”，说明长江径流中的含沙量之高，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变差。那堂课之后，邹老师专门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长江三峡工程要上马，如果有合作单位要提出联合进行三峡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准备派我去。虽然事后有变，没有合作成，但我一直关注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1996年到三峡考察，次年写成了《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当此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时，我正在邹老师门下读博士。

硕士生课程成绩单		学号: 261426	
历史地理	入学日期: 1988年9月	日期	学制: 二年
			授予学位: 硕士
课程名称	学习	课内	考核
	成绩	学时	方式
中国古代经济史	80	40	笔试
中国古代民族迁徙史	80	40	笔试
历史地理学导论	80	40	笔试
历史地理学专题研究	80	120	笔试
以下空白			
论文	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隋唐五代时期疆域与交通”一章。课题名称: 隋唐五代时期历史地理学。指导教师: 汤纲。字数: 5万字。答辩日期: 1989年5月。		
时间	1988年4月至1989年5月	止	负责教师: 汤纲
说明			
负责人(签字):	系主任、所长(签字):	学校(公章):	
汤纲	汤纲	1989年5月	

图2 硕士研究生成绩单（部分）

读研总要毕业，需要写出合格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我自己想出了11个选题（大多与浙江家乡有关），逐一与邹老师讨论；邹老师认为，历史地理初入门不要只盯着家乡，要放眼全国，论文选题要从阅读典籍过程中产生，不应先凭空设想出一个题目来再去找史料填空；为此，邹老师又征求了谭其骧先生意见，谭先生认为如今发展经济摆在第一位，那么看看历史上的产业分布也许是有益的。经过反复讨论，商定研究主题是唐代粮食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邹老师告诉我，学术研究要谦虚，不要动辄冠以“研究”之名，学无止境，让我的题目加上“初探”二字。于是，我从阅读两《唐书》开始，翻阅《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全唐诗》《全唐文》，笔记小说也在视野之内，甚至《千唐志》也曾过目，撰写了唐朝主粮粟、稻的地理分布和唐朝前后时段分布变迁的文章，探讨了这种分布及其变迁的原因。在这期间，不仅阅读了唐史文献，还阅读农史资料，扩大了知识面，但还不够，因为这属于历史经济地理，那么对于当代经

济地理学的理论学习需要补课。为此，经满志敏老师介绍，赴华东师大地理学系旁听黄锡霖老师的《经济地理学导论》课。从复旦到华东师大，要穿过当时的整个上海市区，很远，我自己买了月票，庶可优惠。在此，也感谢满老师、怀念满老师。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翻阅《全唐诗》时完全沉浸于其中，以欣赏的心态阅读，不仅收集史料（例如杜甫诗中的优质稻种材料），还读到了有趣的地名诗（权德舆《州名诗寄道士》），觉得今后可以做两件事：一是编选《我选唐诗三百首》，因为觉得蕲塘退士遗漏了许多好诗；二是为《全唐诗》地名做完整考证，因为像杜荀鹤《再经胡城县》中的地名，今人解释是猜错的，解释柳宗元《黔之驴》的“黔”在今贵州那更有问题，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学位论文初稿写成后，交给邹老师审阅。有一天在文科楼8楼见钱林书老师，他告诉我怎么到邹老师家取论文意见。原来，邹老师累病了，住进了新华医院。王文楚老师主持了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评价还不错，于是乎得到了鼓励，增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自信心（后来拙文连载于《中国农史》上，还获得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论文奖三等奖，受到巨大鼓舞）。20世纪80年代末的毕业生就业，已经开始了“双向选择”，我到北京找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得知历史地理研究室正需要人，为此到历史所办公室拜见了陈可畏主任。当时的副所长李祖德先生，曾公干赴沪，了解我的个人情况，邹老师专门把所长办公室腾出来，安排李所长对我的考察。就这样，工作单位落实，1989年7月27日到北京报到。事后才知道，邹老师与陈可畏先生、与李祖德先生都是很熟悉的。

毕业前夕，邹老师请我吃饭。临别之际，送我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他用毛笔在扉页题写了鼓励的语句：“学海无涯”（见图3）。那一年，邹老师54周岁，比我目前的年龄还小3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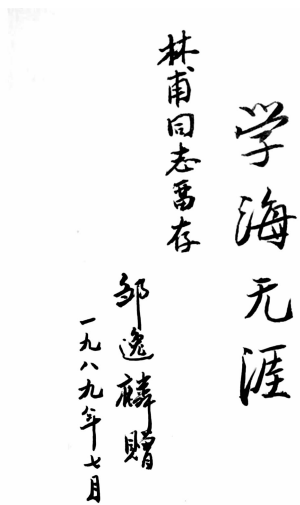


图3 邹老师赠书题字

当时的历史所，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后院，不久搬到了日坛路6号，我们历史地理研究室在6楼的西南角，隔壁正好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